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1900—2010

朱德发 魏建 主编

上卷

1900—1929



人民出版社

I209.6/76
:1900-2010(1)

2012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1900—2010

朱德发 魏建 主编

上卷

1900—1929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296257



人民出版社

本书得到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特色国家重点学科项目经费资助

上 卷

多元一体文学结构的形成

(1900-1929)

主编 朱德发 魏建

本卷作者 (以撰写章节数多少为序)

朱德发	李 钧	周波海
季桂起	韩 琛	李宗刚
魏 建	温奉桥	刘 聪
张 梅	陈夫龙	闫晓昀
	赵佃强	

绪论 世界化与中国文学

一、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换

从目前中国各界对文化的理解与使用考之，极其混乱亦极其泛化，似乎与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关或无关的物体和意识，都可以冠上名目别致、花样新颖的“文化”。尽管“文化”之名随处可睹，无孔不入，然而，笔者仍认同文化的考察只能关注与人的生存发展相联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即文化或是精神文化，或是物质文化，或是两者合二为一。而文学则是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古代中国文学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它与文化混融在一起，尤其先秦以来的散文既是古代灿烂的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神或精神文化几乎都蕴涵于古代文学系统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就是在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探索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转换也是探索古代中国文化向现代转换。所谓古代文学形态的转换，即要探索古代文学作为一个结构整体是何时在何背景下开始解体的，有哪些重要的结构因素因时势而被淘汰，有哪些结构因素经过调整或更新而与现代文学结构发生了对接并发生转变，还有哪些古代文学结构因素仍具有生命力而

直接被现代中国文学结构所吸纳，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在古代中国文学形态向现代中国文学形态的转换过程中，是哪些内外机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呈现出何种特殊规律；到了关节点或转折点，是古代文学形态发生了全方位的转换即现代中国文学完全置换了古代中国文学，还是古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优秀传统仍在现代中国文学建构中弘扬光大，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和牢不可创的“根”，它是否内在地而又积极地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与前行的系统工程？上述问题是笔者力图探讨与解决的，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

对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并非热门话题，已有不少的学术著作和优秀论文问世，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上了相当高的学术层次；笔者只能在汲取他人可用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进行探索，但愿能有所发现有所拓展。不过对有些研究者所持的“断裂论”或“取代论”，即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在五四发生了“断裂”；或曰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现代文学完全取代了古代文学，我是不能完全认同的。实质上这两论的主旨在于断定，通过五四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现代文学是与古代文学毫无瓜葛的，是两种完全异质相对的文学形态。记得笔者曾持过这种观点，但在后来的论著中不止一次纠正过这一见解，现在有些学者依然坚持这一看法。这里不想展开论述，只补充两点：一是文学是一种审美的偏于感性的精神文化，它永远不会发生“断裂”，即使采取暴力手段从表层把它斩断，也如同“抽刀断水水更流”；即使通过大批判把它批倒批臭也会在气候适宜时重新立起来焕发芳香；即使利用改良或变革的手段把古代文学的糟粕清除，也会留下它的精华重放光彩，甚至它被清除的糟粕在相宜的气候下也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这样的怪现状只要到现下的书摊走一遭就屡见不鲜了。这不仅因为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形态不同于物质文化结构在强烈地打击或爆破或燃烧下可以摧毁、散架甚至销蚀，精神文化的文学或用纸媒或用电媒作为介质所装载的是见不到摸不着的历代作家诗人对社会的感悟、人生的体验和自我的感受，甚至是民族的集体

无意识或潜意识，并且是以独特的灵感思维或形象思维方式所构想的千姿百态的文体形式和语言符号而组合成的文本；若是说古代文学的外部形体结构有可能在外力的冲击下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那么与外形结构相联系的文化意蕴或情感内涵是怎么斩也斩不断的，“藕断”尚能“丝连”，况文学乎？所以文学的变革不能采取政治革命的暴力手段，只能把“因势利导”或“推陈出新”或“承传创新”作为上策。更因为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是主体思维开出的花朵，是创作主体文化人格作用的结果，而古代作家诗人的主导思维既有重“顿悟”的整体思维，又有以“取象”为特质的形象思维，虽然儒学传统看重理性，但是它与佛、道结为三位一体而作用于作家诗人主体却形成了以“顿悟”、“取象”为特征的非理性思维，导致古代中国文学创作几度灿烂辉煌的局面，试想这种适宜于文学营造的古代作家的主体思维模式逮及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变革能够完全“断裂”吗？只能经过调整或充实与现代文学作家主体思维对接和契合而运作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构中。至于现代文学是否完全取代了古代文学，两者之间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已有不少的著述对这个问题做了雄辩的阐释。既然古今文学在转换中并未出现“断裂”或“断层”，那“取代说”就站不住脚，不攻自破了。二是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本书探索的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向中国的现代文学转换，而是古代中国的文学向现代中国的文学转换，也就是古代中国的所有形态的文学（既包括汉民族的汉语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族语文学）是否都转换为现代中国的所有形态的文学？这是从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相对应的宏阔视野来洞察古今文学的转换，不只是从现代性的立场上来考析古代汉语文学向现代汉语文学的转换；由于考察视野放大了，文学形态复杂了，因此更不能也不该武断地说古代中国文学在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变革中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了“断裂”或“断层”，一切结论只有经过考察与分析方可获得或验证。

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换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转换以胡适之见乃是常常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己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化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是不经济的，难保退化的。有时候，自然地演化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种自然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

化的趋势赶快实现”。^①这揭示了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两种互动互促的方式，也是中国文学随时而变的转换规律，不过古代中国文学的转换往往是在“自然的演化”的轨道上运行，而这种转换又大多体现于文学体式上。正如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所指出的：“三百篇变而为骚”，“又变为五言七言”，“赋变而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诗之变而为词”，“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这些文体之变也可名之为“转型”，都是无意识地自然演化的。虽然古代中国文学体式的转换主要体现于汉语文学的创构，但是自古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论魏晋南北朝的多民族大融合或者蒙古族主宰中国的元代、满族主政中国的清朝，少数民族文学渗透进汉语文学，汉语文学则同化着少数民族文学，这为现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存共荣、互促互补扎下了根基；特别是古代汉语文学的自然进化，为其在基本格局上向现代中国文学转换做好了较充足的量的积累。这主要体现于：

其一，纵贯古代中国文学内涵并推动其运演的人文精神，及至明末已掀起了波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于我国文化、文学史上就出现“一次早熟的东方‘文化复兴’”^②，既推动了先秦文学特别是散文的空前繁荣，又在散文文本中注入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次“文化复兴”是诸子百家挑起的关于人性问题的论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从先秦散文中便可窥见其观点，道家由于特别强调人的自然性，所以他们视人的价值在于自然性的恢复；孔孟从强调人的社会性出发，认为人的价值在于讲仁义；墨子虽也强调人的社会性，但他却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兼相爱，交相利；法家从人性为利论出发，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表现为以力气去争夺利。尤为可贵的是，孔子在《论语》中正面倡导“仁者，爱人”、“泛爱众”这种具有超越价值的博爱平等的人道主义。不论人性论或以爱为核心的人道意识，都是源于古代中国文化的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它流贯于古代优秀文学的思想内涵，并形成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学精神传统而被现代文学所承续，逮及明末之际兴起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将古代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审美层次。如果说西方十五六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是其中世纪古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1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② 王树人、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巨大思想动力，而它在人文主义思潮中所宣扬的人性和人的本质，主要是人的一些自然属性及人对现实享乐的渴望，所朦胧意识到的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也主要是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力争的生存权和政治权；那么明中叶以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虽然未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深广度，但在向封建理学挑战中对人的确认却达到了发人深省的程度。既提出了“真人”的命题，而这种“真人”则是“率性而行”的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又强调指出“真人”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这种有差异的“性”，则是“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息，性也”；既指明每个生活于世间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索和独立价值，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阐明“穿衣吃饭”是人的最基础的欲望与需要，这是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这种带有现代色彩的人文思潮尽管不足以冲决古代中国文化意识的整体结构，然而它却唤醒了一些人的觉悟，促进了思想解放，把先秦以来对人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古代文学结构在晚清的大调整和向现代转换埋下了伏线，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其二，营造古代中国文学的文人们的主体意识与文的自觉到了明末有所增强，文学观念注入了人学因素而有所更新。由于在以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潮的渗染和洗礼下，不少古代文人或诗人具有独立自由的主体意识和文的自觉性；否则的话，先秦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就不会出现，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李清照等这些世界级的大诗人大词人就不会彪炳于古代中国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学史。而到了明末，以李贽、三袁为代表的文人诗人的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则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启蒙思想先驱者李贽可以说是个傲骨耸然的独立特行之士，尽管他没有公然背叛最高统治者，尚以‘真儒’‘真道学’自居，但实质上他对皇权专制所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程朱理学乃至圣人孔子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尖锐的批判”，特别是“当最高统治者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他投入狱中而面临着生命威胁的时候，他以自刎狱中来对抗残虐的暴力，维护灵魂的永恒价值和自己的学说的真理性”，正如他自白“我头可断而身不可辱”。直接受到李贽独立性格感染和熏陶的还有公安派三袁兄弟，“尽管三袁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他们的独立性格却以‘狂态’为共同特征。‘狂’在他们眼里不仅是自己的高风亮节，也是他们神往的理想人格范型。即使竟陵派的钟惺、杰出戏剧家汤显祖、《南

词叙录》的著者徐渭也是在浊流中保持独立性格的文人。虽然他们的嶙峋风骨与独立人格为儒佛道文化所铸，但其性格内涵的人文因素与晚清以后的现代人文精神是可以相通的。”既然文人具有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则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便进行挑战，李贽创立了“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则主张“性灵说”。不论“童心说”或“性灵说”，皆以人为思考中心，强调以“真人”为本、以“真心”为根来建构文学观，这既是对人性认识的深化又是对文学个性意识的强化。^①文学艺术是作家诗人创造的，文学的演化或转换也是由他们驱动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文人作家都能成为文学转换的推动者，唯有那些“不拘格套”敢于创新的文化先驱者才有可能推动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贽等人文主义先驱者难能完成古代汉语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但是他们却以令人敬畏的魄力和胆识开拓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

其三，以散文与诗歌两大文体为正宗的先秦时期形成的文学格局，演变到明末则初步出现了近似于现代文学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相互辉映的文学格局，并呈示出雅俗并举的美学景观。在具有个性意识的人文思潮的渗透下和真人真心真情文学观的引导下，以及文化先驱者主体意识的驱动下，晚明公安派的诗歌创作在艺术造诣上虽然没有达到足以引导新的诗歌方向的成就，但是他们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的诗歌主张所显示的方向却是正确的，且写出了一些冲破古典审美规范的优秀诗篇，为源远流长的古代诗歌这条艺术风景线增添了新色彩。与诗歌在古代文学格局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散文，到了明末出现同“道统”悖反的以“性灵”为核心的小品散文，体式并无定制，通常篇幅短小，结构松散随意，文笔轻灵有趣，这是散文所获得的一次解放，难怪周作人视其为现代散文小品之源。小说和戏剧这两大文体虽然到了明末仍未进入“大雅之堂”，处于文学格局的边缘位置，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萌动所产生的新思潮的激荡下却有了大的发展，形成了古代文学结构中两大耀目的艺术景观。不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三言”和“二拍”还是戏剧《牡丹亭》等，在审美内容上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人文情怀和人道

① 朱德发：《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齐鲁学刊》，1991年，第3期。

主题，特别是那些以情爱为叙事的小说和戏剧，所表现的情爱意识总是同批判意识交织在一起，对情爱的肯定总是伴随着对灭绝“人欲”的“天理”的否定，对人性的赞美总是伴随着对神性的揭露，这是个具有超越意义的可以与现代情爱意识接轨的母题；为适应人文主义思想在文本中的审美意识的完美表达，小说和戏剧的体式做了较大的调整或变革。如特别发达的长篇小说出现了讲史型小说叙事模式、神魔型小说叙事模式、世情型小说叙事模式、公安型小说叙事模式。而戏剧体裁在杂剧的基础上则有了较大革新，不仅创制了现实时事剧、讽刺剧和丰富多彩的爱情剧，而且戏剧形式趋向多样化、灵活化。晚明形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相生互映的文学格局为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雅”与“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极为突出，“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与‘俗’文学两个方面的”。^①这种“雅”与“俗”并举互促的文学传统对晚清文学的影响深远。

其四，明末人文新潮作用于创作主体的文化人格，决定其对不同文体特别是具有俗化倾向小说、戏剧的营造大多选择了白话语言，借以表现其初获解放的思想情感与内心真声，促进古代文学的语言向白话蜕变，这就成了晚清文学整体结构变革出现的白话趋向的前奏。其实，以白话语言构建文学文本古已有之，并非始于明末，依照胡适的说法“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②而且“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特别是明中叶后“有无数的天才正在那儿用生动美丽的白话来创作《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和‘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擘破玉》、《打枣竿》、《桂枝儿》的小曲子”^③。如果胡适的论述符合史实，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② 胡适：《胡适全集》第1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③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1页。

么明末文学创作的白话化的确为晚清文学结构的调整或新变提供了参照，正如胡适所说的：“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国语的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的速成学校。”^①

既然明末已从古代中国文学母体结构中通过“内发式”的方式孳生出新文学的胚胎，这与西方文艺复兴15或16世纪的情状有所相似，那么东方的中国文学却为什么失去了此次向现代转换的机遇？考其原因极其复杂，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不外是：明末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难能形成历史合力推动文化或文学大转换，而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强控制中心又不可能成为新因素发育的母体，也更不可能使新因素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潜在结构；况且新因素的结合必须有坚强的“中介”，也就是新经济因素在明王朝的政治结构内部找不到得力的代理人，即使一度逸出传统的李贽等接受了市民人文意识的知识者，也遭到封建专政的残酷镇压或毁灭或沉沦。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的人才只输送进封建专制的官僚网络，不可能成为新因素结合的“中介”，反倒成了摧毁新因素的力量。特别是明末清兵入关，不仅给东南沿海发达城镇的经济、文化或文学的新因素以毁灭性的摧残，导致新文学因素积累过程的中断，而所带来的满族文化意识是源于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即使清王朝所汲取认同的中原文化也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能够孕育新结构的因素，乃是与其本民族文化相契合的能够强化其专制统治的部分。它几乎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推行比明朝还要残暴的文字狱，到了雍正时期形成了极端专政，造成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所以这就使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只能走上复古主义道路。明末在精神生产或文艺生产领域出现的新思想新文学因素不可能成为大气候，只能在曲折中萌动。尽管传统文学的转折如此之多艰，然而历史的曲折必然潜伏着发展的种子，即“在明末已经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学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学中继续呈现退化状态，但这种退化并不是消失，而是艰难曲折地延续着。到了清代中期，虽然没有出现声势壮大的文学高潮，但由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

①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筑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3—24页。

个性发展与社会压抑的冲突重新成为首要的矛盾，个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顽强抬头的表现”^①。这时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体现出的文化意蕴、审美意识与审美取向较之明末的《金瓶梅》、“三言”、“二拍”在现代因素的积累上又进了一个层次；然而可悲的是，这些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新因素并不能通过“内发力”而组合成新质的文学结构以推动古代文学的大转换，只能等待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二）

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不解体而其内生成的文学系统也难以大调整大转换，但宗法社会结构的解体仅靠其“内发力”或农民暴动则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或者凭借“历史合力”或者借助异质国家力量的强烈冲击，才有可能使宗法社会解体。正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解读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方可将其视为以武力方式摧毁了中国宗法社会结构并改变其运行方向的“现代性事件”。站在民族立场上怀着爱国胸怀来看待“鸦片战争”，无疑这是英帝国对我国的明目张胆地野蛮侵略，既毁灭了我国的生命财产，又伤害了“大清国”的民族尊严，使中国人蒙受了巨大屈辱，并激起无比愤慨；但如果换一角度来看，“鸦片战争”的爆发，又是否反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强烈冲突？这不仅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武力与武力的对抗，也是战争背后的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两种不同经济形态乃至文化体系的对抗，而对抗的结果则是前者胜后者败。尽管胜者与败者的心理感受有别样的差异，但它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大门、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大门以及宗法社会的僵化结构，却是铁的事实。随后连续不断地发生域外列强的武力入侵，加剧了宗法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清王朝的崩溃；从清王朝的节节失败和列强的屡屡战胜中，越发显现出现代文明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较之清王朝所固守的传统文明要优越得多先进得多。正是在列强现代化武器的打击下和清王朝内部腐败的反作用下，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涌现出有利于古代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1 页。

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换的新物质和新精神条件；而这诸多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大都具有现代性，它们是在现代与古代、先进与守成、东与西、洋与中、新与旧的悖论冲突的错综纠葛中产生的。所以这就给有助于文学变革或转换的具有现代性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带来复杂面目，它既有别于西方话语的现代性又不同于中国修辞的民族性，而是烙上了中国印记的现代性。由于这些条件所产生的综合效用与强力功能，致使古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在晚清文学变革中向现代中国文学开始了结构性的转换。

从政治维度考之，在中西政治文明的反复较量中，面对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危亡，一些仁人志士选择了比清王朝专制政体更先进的政治体制。前有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后有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中提出的“国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为”、“乃生民以宪法而构造之”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而在实践上则前有洋务运动后有维新变法。“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一种稳健的变法改良运动，而面临日益危急的形势，甲午战争以后一种更为激进的变法改良运动迅疾兴起，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①。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实质上都是对清王朝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实行如同日本明治维新所推行的现代民主性的君主立宪，虽然这两次政治改良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是“西政”及其民主意识却深入人心；特别是通过对维新变法的反思，以白话文学作为“新民”利器的启蒙思潮则勃然而起。

不仅政治改良为古代文学向现代转换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难以再出现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即使出现了也可以到国门之外的异国提倡新文学，国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了；而且从经济维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屡次战争中被列强瓜分去的沿海地区的各个城市，既有外资企业于租界的疯狂兴办，又有民族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的茁长，这就使现代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及其市民意识快速增强。为满足其精神文化的消费和审美的急切需要，以现代技术印制的平版书籍、期刊杂志、各类报纸等构成了繁盛的文化市场，借助现代媒介的迅速广泛地传播，如同给文学的发展和转型插上翅膀。因此，现代经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8 页。

济的繁荣、文化市场的出现、传播媒介的昌兴以及市民阶层的崛起，这不能不使沿海城市尤其是沪、京、津这样的大城市成为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策源地与发祥地。如果说作为北方的在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强势迫使下步入现代化轨道的北京，仍笼罩着权利角逐、官场腐败的保守气势，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处于相互混杂纠缠的状态，尽管1905年废除科举而新式教育兴起为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培养了人才也制造了舆论，然而这些人才和舆论往往是中洋杂糅新旧兼备，难免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涂抹上杂色；那么偏于南方的上海在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入侵而划定的租界殖民区的合力推动与渗透下，则成为中国第一座全方位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大都会，华洋杂居，中外通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实业昌兴，经贸繁荣。尤其引入西方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加快进一步驱动了上海现代化的步伐，这越来越拉开了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方方面面与内地城乡的巨大差距，致使上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向现代化转变的重镇和策源地。仅就文化工业来说，“现代印刷业推动了书报业，使其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捷，读者广大，维新变法人士总是把办报纸、开学堂、倡新学互相联在一起”^①。严复、夏曾佑、王韬、黄遵宪、梁启超等，是推动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换的先驱者，大都是借助兴办报刊来完成的。例如：为古代文学转换提供进化论与人本论思想武器的严复，在天津参与创办的《国闻报》（1897）发表了他把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的《天演论》，以及他与夏曾佑合写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这两个文献所宣传的进化论与人性论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和文学形态向现代转换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是划时代的；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6）由梁启超主笔，倡变法革文学；1904年上海创办的《时报》，梁启超对其新闻报道进行革新，并开设“小说”、“余兴”诸栏目，这为中国报界开辟了文学阵地，又为晚清古代文学向现代转换提供了媒体；至于稍晚（1907）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报》（后更名《时事新报》）对于助推文学转型，刊载新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与大陆不可分割的港澳台诸海岛，鸦片战争前后变成殖民地，特别甲午战争后台湾落入日本之手。它们先后在殖民化

^① 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过程中，不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既与古代中国传统融合又与其决裂，并逐步变成现代化的城市或区域；而中国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也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看到，“香港大约在1928年开始有新文学”之前即晚清以降时期，“香港经济建设虽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的规模日趋现代化，但人们的思想仍很守旧，文化仍很落后”；就是到了“20年代初，香港小学校的课本只限于《论语》、《孟子》、《诗经》、《故事琼林》等等”^①，乃至1924年才创办类似晚清半文半白的刊物《小说星期刊》，这说明香港文学步入现代化历程较晚，也表明经济的现代化与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并不完全是同步的；然而，台湾地区却与香港有所不同，仅活跃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三大诗人连横、胡殿鹏、林资修所创作的诗歌就为现代中国文学增添了奇葩。

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是后者决定前者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的直线因果关系，实质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其对于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并不都是等值的或直接的。从晚清的古代文学向现代转换来看，起作用最大的最直接的、影响最深最远的则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不仅给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换的趋向以制导或以调整，给文学文本建构以意蕴或以灵魂；并且给驱动文学转换或营造新文本的仁人志士的主体意识或人格塑造注入了现代思想或美学意识。对于前者来说，晚清文化先驱者处于一个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外国列强瓜分我国的救亡图存的危机环境，而且中外文化思潮的碰撞与交汇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社会重大问题的焦点已聚集在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革上，否则中国就难能得救和振兴。“于是在这种情势与背景下，便在摇摇欲坠的清朝王国里兴起一场以探讨中国人的价值、历史命运、生存状态、国民根性为人学中心内容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晚明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人学思想，是从儒家的本源文化中分化出来的，那么晚清的人学思想，则主要源于西方现代文化意识。虽然晚清人文思想对晚明以自然论为基石的人学思想也有不自觉的承续或不谋而合之处，然而自觉地有意识地汲取的文化思想却是西方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及其他文化意识，这就决定了晚清人学思想及其

^① 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派生出的文学观念不同于晚明人学思想的特点和文学意识的现代化的特征。”^①

任何一种新文化思想的倡导或传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和认同，亦不是瞬间即可形成思想潮流，必须借助少数文化先驱者如严复、梁启超等积极地汲取新思想并创办现代媒体大力传播新思想，这样方能形成强劲的新思潮；它既可以塑造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又可以聚集巨大的思想能量驱动古代文化文学在接纳与承传中向现代化方向转变。晚清先驱者在中外文化思想比较中所力图建构的现代人学则是以“国民”为本位，以“自由”为核心，以“新民”为旨归；而这种人学思想既有对先秦以来民本主义思想的承传，又有对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吸纳，前者也许是“自然的非自觉”的承续，而后者则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拿来”。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崇真”的科学思想和“为公”的民主思想，这“与中国理道初无异”，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论世变之亟》）；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推行科学和民主就是因为只重专制不讲自由，导致国家日趋落后腐败。而西方国家正是因为有了自由的社会环境，故畅行无阻地实现科学与民主并日益强盛起来，因此他提倡改革的根本必须以自由精神“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借助思想启蒙来提高国民素质与人性觉悟。这与他在《天演论》中主张的进化论新思维一样，向变革者指出了“治华”的当务之急是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并以现代意识来唤醒他们。虽然以“自由”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家严复提倡在先，但是真正下大力气阐释并播扬这一现代人文思想的却是梁启超；特别是他于1902年亡命日本后尽力地汲取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启蒙思想，连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20篇鼓吹思想启蒙的论文，后汇编成的《新民说》似可视为其人学思想的集大成。《新民说》的宗旨是塑造有别于古代社会文化人格的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而这种理想人格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他有强烈的求新求变的进取心，体魄心态强健，遵纪守法，爱己尊人，以自由民主为思想之魂，这似应看做现代文化先驱者的共同人学观念。梁启超为塑造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便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深刻剖析了中国人性积弱的多维根源：其中之一就是处于一个“竞争者，进化之母”的时代，但其体制却是“大一统”，致

^① 朱德发：《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